



含德与风教：萧统推崇陶渊明之文化因由探析*

王伟 倪超

摘要：东晋以迄隋唐，陶渊明在文坛颇受冷遇，唯萧统对其颇为推崇，究其原因，则在于作为储君之萧统欲借陶渊明之德行“风教”之举。细论之，萧统对陶渊明推重之文化因由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由《昭明文选》择陶诗可见萧统之文学思想与主张。其次，《陶渊明传》增补部分反映了萧统“危行言孙”“父慈子孝”的儒家思想。最后，《陶渊明集序》主旨并非道家而是“含德”。萧统的《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隐舍着一位储君对未来执政的思考，反映了其对陶渊明“贤者之隐”身份的接受与认可。

关键词：萧统；陶渊明；《昭明文选》；含德；风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2-0068-08

众所周知，陶渊明及其诗文学作品在南朝文坛与批评界颇受冷遇。颜延之《陶徵士诔》述陶渊明平生而简概其作品为“文取指达”^[1]，刘义庆《世说新语》记东晋文人雅士却无陶渊明，刘勰《文心雕龙》文理巨制对陶渊明只字未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记》评述五言诗人也未及陶渊明，沈约作《宋书·隐逸传》虽有陶渊明但未评论其诗文，钟嵘《诗品》把陶渊明诗列为中品已属拔高。纵观南朝文坛，独萧统对陶渊明尤为推崇，先后为他編集写作序，在唐前陶渊明接受史上殊为突出，其间原因值得追索。

一、萧统尊陶之原因

在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中，学界对萧统推崇陶渊明之原因上投注了相当的关注，经归纳梳理，可大致别为如下几类。

有学者认为：“萧统生存在‘隐风’如此浓郁

的时代，社会风气的熏染，佛教思想的陶冶，钟情山水的个性，使他对隐逸有着浓厚的兴趣。”^[2]然而，《昭明文选》（下称《文选》）中隐逸诗有左思、陆机各一首，却未有陶渊明之作。萧统本人“性爱山水”^[3]⁴⁴⁰，但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各方面正合萧统兴趣爱好，事实上萧统在《文选》中录谢之诗文是陶的三倍有余，也可以说明谢灵运比陶渊明在萧统眼中位置更高。退一步讲，即便不是谢灵运，魏晋时期隐逸诗人颇多，如嵇康、阮籍、向秀等，名气才学和隐居之志皆不在陶渊明之下，萧统想要寻找归隐之道，大可不必以陶渊明为尊。何况，“我们看到另一个陶渊明，不见得那么自然、任真与平淡”^[4]²⁰³，归隐是文人仕途受阻的无奈选择，陶渊明亦是如此。萧统“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3]⁴⁴⁰，断狱公正，天下称仁，时常上书奏议国是，亦未见得有归隐之心。

有学者认为萧统与陶渊明在诗文上趣味相

收稿日期：2020-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出土墓志与隋唐家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27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维视域下唐代碑志与文学研究”（20BZW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伟，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119），主要从事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倪超，男，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陕西西安 710119）、江苏警官学院讲师。

投,“《文选》选文定篇‘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陶渊明作品看似不符,实际上却非常符合”^[5]。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6]155}可以看出,萧统虽崇尚文质温厚风格,但丽典雍容是必不可少的,刘孝绰的《昭明太子集序》:“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6]245}也可佐证萧统的文学观依然和梁朝文坛追求的文采繁富基本一致,这与朴素见长的陶诗风格大为不同。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萧统诗文“无丝毫胎息渊明处”^{[7]238}。除此之外,萧统否定陶渊明的《闲情赋》,曰:“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6]200}而萧统《文选》中却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等“卒无讽谏”之作。李剑锋先生认为《闲情赋》是“因为主体情感表现过于热烈浓艳而被否定”^[8],然既然《文选》中有“情”赋一类,说明萧统对文学中的情欲是肯定的,至少不是否定的。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曰:“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3]447}更表明“情性”之文为萧统所认同。那么从萧统的文学理论看,陶渊明朴直的诗文是与当时文风相悖的,也不符合《文选》的审美,萧统评判陶渊明诗文更多是从政治道德的角度出发。

有学者认为萧统作《陶渊明集序》与蜡鹅事件有关:“此文为陶渊明文集之序,而全篇重点却在申说韬光晦迹、遁世隐居可以全身避祸。此种思想之产生,盖与昭明晚年因埋蜡鹅事发,遭遇梁武猜忌有关。”^{[6]201}此说似乎也站不住脚。其一,《南史》所记蜡鹅事件存疑。“《南史》较诸史,雅多逸闻,然但一二碎事本史失载而《南史》发之,若厌伏果真,父子间许大猜衅,姚察作传,岂容全不照管?恐姚无此缺漏也。”^{[9]840}其二,萧统作《陶渊明集序》和遭梁武帝猜忌在时间上不符。据桥川时雄所说:“余所见之旧钞《陶集》,昭明《陶集序》末记云:‘梁大通丁未年(527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10]4}也就是说,《陶渊明集序》所作时间为大通丁未年,而萧统遭忌的时间,俞绍初先生据《梁书》关于大通三年(529年)太子太傅之位突然重置和萧统

对弈扰道之梦等记载,加之《文选》仓促杀青,推断云:“昭明之失宠当在是年十一月以前,南康王绩薨后未久。”^{[5]318}作序在前,遭忌在后,两者相差两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三,《陶渊明集序》韬光养晦之旨与国势渐隆的背景不相衬。当年正值梁魏混战之际,梁朝兵锋日盛,大通元年(527年)春“司州刺史夏侯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等出义阳道,攻魏平静、穆陵、阴山三关,皆克之”^{[11]4722},“五月,丙寅,成景俊攻魏临潼、竹邑,拔之。东宫直合将军兰钦攻魏萧城、厥固,拔之”^{[11]4724}。如此攻城拔寨势力扩张之时,萧统以东宫太子之名作韬晦之态,不合乎朝野上下所盼。

以陶渊明的隐遁标签去判断萧统的所思所想,未免有些思维固化,那么能否换个思路,从萧统出发去思考其在众多诗人中选陶渊明的实际用意。

二、《文选》择陶诗文之文化因由

《文选》由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其中录陶渊明诗文七题八首,较前人寥寥数语可谓相当可观,自此也开启了唐宋尊陶的接受史。《文选》中选录陶渊明诗文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挽歌》《杂诗(二首)》《咏贫士诗》《读山海经诗》《拟古诗》及《归去来》。这些诗文自然体现了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2]3}的文学价值观,而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出发,也有规律可循。

《归去来》或与沈约有关。沈约《宋书·隐逸·陶潜》载:“赋归去来,其词曰……”^{[13]2287}将《归去来》的原文引用。而且,《归去来》较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和言志辞朴的《与子俨等疏》《命子诗》,更符合《文选》的选择标准。沈约与萧统亦师亦友,萧统结撰《文选》,从陶渊明三篇赋辞中取《归去来》或受其影响。

《读山海经诗》《拟古诗》或与钟嵘有关。钟嵘《诗品·中》:“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14]337}“欢言”之句出自《读〈山海经〉诗》,“日暮”之句出自《拟古诗》,钟嵘对陶渊明人品及诗文的评价是开山之作,奠定了陶渊明成为隐逸诗人的根基。钟

嵘曾任晋安王萧纲的部下,“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3]1802},负责撰写参军章表,而萧纲乃萧统之弟,两人时有书信往来谈文论诗,如《答晋安王书》。所以,萧统对钟嵘应有耳闻,对《诗品》亦当有所接触,《读〈山海经〉诗》《拟古诗》之选或受其影响。

《咏贫士诗》或与云鸟意象有关。陶渊明《咏贫士诗》七首皆为五言佳品,《诗品·下·序》:“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14]459}然而七篇为何单选其一?纵观七篇,唯其一者有云鸟意象,“孤云独无依”“众鸟相与飞”^{[15]472}。萧统从其父梁武帝信佛,常游寺庙,作诗以记,诗中云鸟意象尤为突出,如梁武帝名作《游钟山大爱敬寺诗》:“飞鸟发差池,出云去连绵。”^{[6]22}萧统《和上游钟山大爱敬寺诗》:“舒华匝长阪,好鸟鸣乔枝。霏霏庆云动,靡靡祥风吹。”^{[6]18}另外,鸟鸣似乐声,常被视为佛法之音。云鸟意象高阔飘逸,恰合佛义之象,又显游赏之情,“这一切使得客观之景、之物完全获得了审美独立性”^{[16]159}。萧统选陶渊明《咏贫士诗》之其一,或与云鸟意象分不开。

《杂诗(二首)》或与菊花香气有关。此二首诗乃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其五、其七,“萧统将诗歌的标题从《饮酒》改到《杂诗》,轻描淡写陶渊明和酒的亲密关系”^{[17]242},不与酒相关与何相关?总览《饮酒二十首》,唯其五、其七者有菊花之气。时萧统精理佛法,参与讲席,诗云:“惠义比琼瑶,薰染等兰菊。”^{[6]9}智慧的佛义好比美玉,听之犹如被兰菊香气熏陶。萧统之母丁贵嫔也奉佛,“尤精《净名经》”^{[3]423},《净名经》即《维摩诘经》,经中有闻香一说:“菩萨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18]188}中土未有佛国香树,萧统以菊花之香喻菩萨妙香,使之本土化文学化,在选陶渊明饮酒诗时,菊花香气或成为其优选之理由。

《挽歌》或与陆机有关。陆机被刘勰欣赏,“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19]243};刘勰被萧统爱接,“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3]983}。因此,陆机诗文非常受萧统的赏识,《文选》“选录陆机诗歌52首,居入选作家之冠,显示了对陆机的重视”^[20]。陶渊明《挽歌》排于三国魏缪袭、西晋陆机诗歌之后,三人三题

五首陆机占其三,皆为挽歌。“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21]345}陆机挽歌以死者自叹创诗歌新例,《文选》所录挽歌也都有这一共同特点,以死者的视角描写送葬悲哀人逝无着。可以说,萧统是以陆机挽歌特征选陶渊明之挽歌诗。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或与刘孝绰有关。《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于隆安五年(401年),陶渊明37岁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于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40岁任徐州刺史刘裕参军,这三年是陶渊明自出仕以来官职最为显要的时期,此后义熙元年(405年)解印归田,不再出山。《文选》择这两首诗颇有代表意义,而且两者皆表达了陶渊明身在官途但心系田园,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矛盾的状态。这与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有异曲同工之妙,倦于官场,远害避祸。而谢朓是刘孝绰最为拜服之人,“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21]362}。《颜氏家训》以谢朓关联陶渊明,那作为《文选》编者的刘孝绰以谢朓诗韵择陶渊明类似诗文,也未尝不可。

总而言之,《文选》择陶之诗文一是受人指引,二是意象贴合,凸显了萧统“独擅众美”^{[6]245}的慧眼。如此看来,萧统在接受陶渊明的过程中,与时代背景、太子身份、周边人事都密不可分,他能选取陶渊明历久弥新之作,原因正在于他的政治眼光和文人群体的帮助,这对他的《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都有影响。

三、萧统《陶渊明传》增补的儒家思想背景

论萧统的《陶渊明传》,不得不言及在萧统接受陶渊明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沈约。天监五年(506年),“以右光禄大夫沈约领太子詹事”^{[6]277},沈约负责教育领习太子,从萧统6岁直到13岁,可以说萧统对前人事最基础的认知来

自于沈约,对陶渊明最早的接受也于此时完成。

沈约在《宋书》中记载了陶渊明生平主要事迹,较颜延之《陶征士诔》更加详细丰富,增补事迹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性嗜酒”^{[13]2286},如种秫酿酒、王宏送酒、延之共醉、葛巾漉酒;二是“耻复屈身后代”^{[13]2288},如著文皆题晋氏年号。萧统评价陶渊明“篇篇有酒”以及“贞志不休”皆可源于此。沈约还记载了反映儒家思想和宗族观念的《与子俨等疏》《命子诗》,使萧统形成陶渊明“安道苦节”的儒家卫士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沈约虽将陶渊明置于《宋书》隐逸篇,但沈约说的“隐”是“贤人之隐,义深于自晦”^{[13]2275},是以儒家入世思想为基础的德修之道,而非远害避地的纯粹隐逸,这对萧统接受陶渊明的隐士内涵定位有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只有颜延之诔文而无沈约传文,如果没有沈约对幼年萧统的影响,也许萧统不会对陶渊明有如此直观的认识和思想的认同。

萧统《陶渊明传》在继承了沈约书写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删,从中可以看出萧统所要表达的重点所在。萧统故意不提沈约所记“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13]2288},可见萧统有意维护陶渊明的贤德之名,而增补部分更有指向性: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雘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

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6]191-193}萧统增补部分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可归纳为两部分:一是“危行言孙”。论语:“子曰:‘邦有道,危行言孙;邦无道,危行言孙。’”^{[22]164}当朝廷

昏庸无德时,文人应当行为正直,但言语要谦逊谨慎,这是儒家思想在论隐士之道时最为深刻的要义之一,陶渊明就践行了这一理念。时东晋已亡,刘宋当道,陶渊明自居东晋之臣,视宋为无道,面对刺史之邀,托病不出,言语上却很谦卑,不敢以圣人自比。在看到同侪经不起劝诱出山讲礼且高谈阔论时,陶渊明加以讽刺,可见其儒家隐士自处之道。二是“父慈子孝夫义妇听”。《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3]268}父母以慈爱待子女,子女则以孝顺报父母,丈夫以道义待妻子,妻子则以顺服侍丈夫。陶渊明体谅儿子生活艰辛,送劳力助其养家,并叮嘱善待下人,是为慈也。陶渊明妻子亦能勤俭持家,不畏贫苦,志同道合,可见陶渊明作为丈夫必守其义。萧统对于父子之情特别在意,“太子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还宫”^{[3]434}。不仅如此,萧统对他人的父子之情也很在意,“徐勉子悱卒,昭明遣使吊慰之”^{[6]308}。各方面看,萧统确实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对其父其母,以至于他人父母,他都力行孝道。所以,萧统在《陶渊明传》中增补父子夫妻之家事,也就事出有因了。

从篇幅上看,萧统《陶渊明传》共近九百字,增补处近三百字,占三分之一。从内容上看,萧统分别展现了陶渊明于上、于下、于朋、于妻的相处之道,于上不卑不亢,于下爱护善待,于朋和而不同,于妻勤苦同当。从思想上看,萧统意在突出陶渊明的儒家形象,安贫乐道,自力耕耘,子孝妻贤。通览全篇不难发现,萧统较颜延之、沈约强调的是陶渊明的躬行儒道和修己齐家,前人所述陶渊明的归隐和嗜酒已然成为人物背景,贤德已占主要位置。隐和酒都不是单纯的存在,而是为了通过隐居的自处和饮酒的沉浸达到藏德于胸、守道于行的内圣之境。外表自由恬淡,内在道德之至,可谓儒家之隐。

四、萧统《陶渊明集序》的“含德”主旨

陶渊明诗文确有家思想倾向,但说“萧统在《陶序》中则主要以道家思想为准的推崇

陶”^{[24]96}，从其所在的政治环境而言是说不过去的。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舍弃道家归入佛门，且笃定佛法为唯一正道，下诏曰：“弟子比经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散善，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25]242}梁武帝舍道入佛，斥道家为邪道，“孝谨天至”^{[3]443}的太子萧统岂敢以道家思想著书立说。

细绎萧统《陶渊明集序》可知，序文前部虽大谈隐晦之理，但意在突出先德后隐。沈约依《论语》孔子之言将隐逸之人分为隐者和贤人，“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13]2276}，萧统列举事例正合这两类：一类道家圣贤，庄周、安期生、老莱子，庄子曾为漆园吏、安期生献策项羽、老莱子为孝着彩服，皆为“贤人”；另一类帝王之君，伯成、唐尧、子晋，伯成曾列诸侯、唐尧一统华夏、子晋吹笙凤鸣，皆为“隐者”。而所提到的反面典型，苏秦、卫鞅、主父偃、楚庄王、霍光，与之相反，皆为纵横无德之人。萧统的隐晦之例举只是论据，论点已在章首标明：

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6]199}

圣人心中有德，品德修身已达至高境界，言行随性但不逾矩，才能至大却不显露，于自然中养气，于道理中治学；自我提高的关键在于身体力行，亲自投入到生活之中，身心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在萧统看来，隐逸之道，不是选择隐居去博得虚名，而是德道至高后必然选择韬光养晦。天监十四年(515年)，萧统行冠礼赦天下，开始处理日常政务，梁武帝下诏招隐求贤曰：“若有确然乡党，独行州门闾，肥遁丘园……并即腾奏，具以名上……庶百司咸事，兆民无隐。”^{[3]161}萧统为此仿效曹植《七启》撰文《七契》招揽隐贤，通过君子和逸士的对话劝说贤者应出仕效力，而非藏器待时，文末曰：“岂有闻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6]84}可见作为储君的萧统站在国家立场对贤才隐居是持反对态度的。因此，萧统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不是因为其隐士身份而是其修己含德，重在彰显其德，而非向往其隐。陶渊明亲自躬耕忍受贫苦，他的归隐是因德高道悟而需遁世，他的嗜酒亦是如此，酒为表象德为根基，所以萧统曰：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6]200}

圣人将世事政务寄于情趣之中，陶渊明将德道修行寄于饮酒之中，这应该是萧统对陶渊明嗜酒的理解。其实萧统对饮酒不感兴趣，因为他是佛教徒，“太子自立二谛、法身义，并有新意”^{[3]435}，这可能也是《文选》改陶渊明饮酒诗为杂诗的原因。所以，萧统所美陶渊明之酒，并不是赞扬嗜酒，酒只不过是寄托物，或者只是一种表现方式，内核是对仁德的坚守，对道义的秉持。萧统看见的陶渊明，本意不在饮酒作乐，不在醉生梦死，而在于托醉酒之象避开凡俗之扰，保守真德。

至于陶渊明的诗文，萧统更是直接了当地将“文”与“德”联系在一起，曰：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6]200}

陶渊明的含德在于“贞”，不事二主，重乎节操；在于“耕”，自耕自种，自给自足；在于“笃”，忠于信仰，不偏不移。这在耕读时代的文人世界里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陶渊明的德行在当时已经广为传播了。萧统叔父萧秀于天监六年(507年)出任江州刺史，“及至州，闻前刺史取徵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3]899}。当时萧统出居东宫，正式建牙开府，此事对萧统接受陶渊明之德应有启发。萧统增一“含”字曰“含德”，更符合陶渊明外表“隐”“酒”而藏玉于山的儒家形象。

五、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风教”重点

萧统在接受陶渊明的过程中，欣赏其品格，推崇其含德，在前人标榜隐士的基础上又更加深化了儒家的内涵力量，使陶渊明更为文人所重，更为教化所用，《陶渊明集序》最后清楚地点明：

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6]200-201}

“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一句出自《孟子》：“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26]256}萧统以陶渊明比伯夷，取其不屈二姓之志，舍其隐世

不出之行。首先，孟子论伯夷曰“治则进，乱则退”^{[26]256}，萧统《陶渊明传》中檀道济访陶时已说过此理，被陶渊明一口拒绝，说明萧统接受的陶渊明之隐与伯夷之隐不相同，否则前后矛盾。其次，假如萧统是以伯夷之隐赞美陶渊明，编集作序行于世，那意思就是当朝横政、所事非君、贤者须隐，梁武帝岂不深究，显然不可能。最后，正如陶渊明所说“何敢望贤”，伯夷乃帝王之后古之圣贤，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不必傍游太华”也正符合梁武帝舍道行为和萧统《七契》中招隐之旨。因此，萧统以《孟子》之语评陶渊明，非伯夷之隐评陶渊明，更拉近了陶渊明与儒家的关系。

细品概括，萧统认为，读陶渊明诗文就会变得“勿竞”“勿鄙”“勿贪”“勿懦”“蹈仁”。然而，“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27]4}，内容基本是田园躬耕、歌颂隐者、咏怀古人、寄酒消遣，这与萧统所说的不争名逐利、不鄙弃吝嗇、不贪婪吞没、不懦弱胆小、不求爵禄并不能完全对得上号，可见萧统在有意制造陶渊明诗文“风教”的作用，品格要求的五个方面想必不是随意而写，反映出萧统作为执政者对文人百姓的教化思路。若据桥川时雄所说，《陶渊明集序》作于“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那么作序之时正是在南朝梁于是年三月改普通年号为大通后不久。要知改元对于国家而言并非小事，标志着推陈出新别是一体，萧统身为太子作此序文，又强调品德风教，应有政治宣扬之意。查史料所载，萧统在此年经历的朝局人事恰与“风教”重点相契合，试论之：

“勿竞”之言或与徐勉有关。徐勉在萧统七岁时领太子中庶子，“太子礼之甚重，每事询谋”^{[3]983}，在萧统29岁时的蜡鹅事件中固谏梁武帝才保太子之位无虞，可见徐勉在萧统一生中何等重要。不图虚名不重财利是徐勉此人的一大品格，他与同岁的王融有着鲜明的对比。“琅邪王元长才名甚盛，当欲与勉相识，每托人召之。勉谓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难可轻弊衣裾。’”^{[3]979}王融乃东晋宰相之后，徐勉自幼孤贫却不接王融伸过来的橄榄枝，难能可贵。后来，“融躁于名利”^{[28]576}，陷于帝位之争被赐死，时年27岁。

而观徐勉，梁武帝非常器赏，授予高位，但徐勉总是谦让解辞，如“求换侍讲，诏不许”“频表解官职，优诏不许”^{[3]983}“勉以疾自陈，求解内任，诏不许”^{[3]996}，此外他还散财救济贫苦，“俸禄分贍亲族之穷乏者”^{[3]997}。正是这种不争名利之德，使徐勉及居重任，善始善终，享年70岁。《陶渊明集序》所作时大通元年，“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中卫将军”^{[3]189}，徐勉的高位就职对太子有直接影响，萧统敬重徐勉为人，所言“弛竞之情遣”或受其感召。

“勿鄙”之言或与刘孝绰有关。刘孝绰与萧统的关系非同一般，天监元年（502年），萧统两岁，刘孝绰即为太子舍人，陪伴其左右。刘孝绰文采卓群，深受萧统敬重，“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3]1258}。不过，刘孝绰恃才傲物不能容人，对到洽、何逊等人不屑鄙之，“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3]1260}，“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21]345}。终于，刘孝绰鄙夷他人招来了祸端，普通六年（525年），到洽任御史中丞，弹纠百官，抓住刘孝绰带美女入豪宅而弃老母于陋室的失德行径，参劾致其免官。值得注意的是，刘孝绰诸弟为兄出气，奏文历数到洽之过，“又写别本封呈东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也”^{[3]1260}，萧统与刘孝绰关系密切却连看都不看，还命人烧毁，可见萧统深恶刘孝绰不孝之失和文人间“鄙吝”之举。大通元年，刘孝绰重被启用，“起为西中郎湘东王咨议”^{[6]313}，刘孝绰除启谢武帝外，“又启谢东宫”^{[3]1268}，说明萧统在他复起之事上有所帮助，谢辞中满是贤者见妒、必待明察的道理，《陶渊明集序》作于此时，萧统忽言“鄙吝之意”或是有感而发。

“勿贪”之言或与周舍有关。周舍先为太子洗马，后为太子詹事，总理东宫庶务，政务与萧统息息相关，责任颇重，然而出现了贪墨丑闻：“普通五年（524年），南津获武陵太守白绢书，许遗舍面钱百万，津司以闻。虽书自外人，犹为有司所奏，舍坐免。”^{[3]977}周舍生性俭素，衣食住行皆为简朴，没想到晚节不保，于是年抑郁而卒。此事萧统印象深刻，不仅与周舍任太子詹事有关，还与时局有关。“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饌为小食。”^{[3]441}

普通五年,梁朝大将悉数尽出,成景俊、裴邃、元树、彭宝等率军攻魏,导致后方吃紧,萧统以上率下,紧衣缩食,而在此时周舍贪墨事发,反差明显,难辞其咎。其实,周舍当时以清廉自居,梁武帝诏曰:“终亡之日,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3]978}周舍之父乃前朝中书侍郎,家境殷实,至此廉洁于斯,贪廉只在一念之差。萧统于《陶渊明集序》中云“贪夫可以廉”之语,陶渊明未有纠贪之事,何来贪廉之论,此语或起于周舍贪廉之变故。

“勿懦”之言或与萧渊藻有关。萧渊藻乃萧统堂兄,同氏宗亲又兼太子中庶子,其英雄事迹为萧统所钦佩。早年边境作乱,聚众数万,“渊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议,欲自击之。或陈不可,渊藻大怒,斩于阶侧。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楯御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3]944},萧渊藻最终平叛。萧渊藻不怯不懦,奋勇向前,以弱胜强,而后没有恃功自大,保持谦退,不求闻达,可谓国之良将。大通元年三月,“以左卫将军萧渊藻为中护军”^{[3]190},统领宫廷禁卫军,对太子之位非常重要,萧统时作《陶渊明集序》言“懦夫可以立”,或期臣民有萧渊藻之勇,保家卫国。

“蹈仁”之言或与萧纶有关。萧纶乃梁武帝第六子,萧统之弟,封邵陵郡王,但在普通五年被罢黜官职削夺爵位,《梁书》记载:“五年,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兖州,坐事免官夺爵。”^{[3]1123}可想事态严重,至于细节,《梁书》却未有说明。不过《南史》对此详解,萧纶“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28]1322},梁武帝对他严厉责问,他也不思悔改,更加骄纵悖逆。梁武帝遂欲将萧纶下狱并赐死,幸亏“昭明太子流涕固谏,得免,免官削爵土还第”^{[28]1323}。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帝王家里,萧统能为残暴的萧纶说情,保其性命,可见仁义之心。在萧统的感化下,萧纶有所收敛,重归正途,于是“大通元年,复封爵,寻加信威将军,置佐史”^{[3]1124}。萧统所言“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或有对萧纶恢复爵位的劝勉之意。

综上所述,萧统总结陶渊明诗文有使人“勿竞”“勿鄙”“勿贪”“勿懦”“蹈仁”之功,而陶渊明的生平诗文与此并无直接联系,萧统作序结语

非一时兴起,而是政治经历和深刻思考使然,借陶渊明之德行“风教”之举,若萧统继承帝位,其育民之术和教化重点也正在这五个方面。

余 论

在《作者作为生产者》一文中,班杰明(Walter Benjamin)认为:“作品对于生产关系说出些什么是次要的,主要要强调的是该作品在成产关系中有何种功能。”^{[29]473}历史上修文撰书大都为了产生某种社会功用,抑或服务于王朝的正统建构,生产并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30],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唐武则天编纂佛经、宋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概莫例外。所以,抛开萧统个人定位,他作为一国储君,其言行必定考虑于国于民的影响,爱嗜陶文并亲自立传、編集、写序,如此大动作,需有一定的政治需求和功能指向。由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刻板印象过深,学者常以陶渊明之性推萧统之心,不顾萧统太子身份和朝局背景,不考虑萧统接受差别和行文论点,仅以文字表意为由,指其有退隐之迹和道家思想,实有偏颇。萧统深受儒家与佛教的双重影响,虽有解脱心态,但“事实上这根本做不到,像萧正德之流绝不会因为他仰慕隐逸,笃信佛教而减轻对他的仇恨;梁武帝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太子真的去做隐士或和尚”^{[31]80}。总之,萧统的《文选》择陶诗文已经显示了政治地位和文人群体对他的影响力,《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隐含着位储君对未来执政的思考,反映了萧统对陶渊明式的儒家思想的接受和再认识,这是文学创作对于政治经历和周遭人事的反映,或可言偶然,也可言必然。

参考文献

- [1]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刘中文.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J].求是学刊,2003(2):91-96.
- [3]姚思廉撰.熊清元校注.今注本二十四史[M].成都:巴蜀书社,2012.
- [4]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5]马朝阳.从《文选》选陶渊明作品见萧统的文学观

- [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6):151-157.
- [6]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 [7]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8]李剑锋.陶渊明《闲情赋》的历代接受与阐释[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1):155-164.
- [9]张燮撰.陈正统编.张燮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0]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M].北京:文字同盟社,1931.
- [11]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2]萧统.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4]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15]陈宏天等主编.昭明文选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 [16]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 [17]Wendy Swartz.阅读陶渊明[M].张月,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8]赖永海主编.高永旺,张仲娟译注.维摩诘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9]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国书店,2018.
- [20]陈璐.论《文选》对陆机诗歌的选录[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2):27-31+58.
- [2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3]王文锦.解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4]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
- [25]释宝成编撰.王孺童点校.释氏源流[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2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27]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28]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9]夏铸九,王志弘.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M].台北:明文书局,2002.
- [30]王伟.“正统在我”:中古正统建构与文学演进[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2-114.
- [31]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Xiao Tong's Praise and Advocation of Tao Yuanming's Thought on "Inherent Morality" and "Civilizing Education"

Wang Wei and Ni Chao

Abstract: From Eastern Jin Dynasty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Poet Tao Yuanming was treated rather indifferently by the literary world. Xiao Tong was the only one to praise Tao Yuanming, because Xiao Tong, as heir to the throne, wanted to civilize society through Yuanming's virtue. Specifically, Xiao Tong's acceptance of Tao Yuanming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Xiao Tong's literary thought and proposition can be seen from the selection of Tao's poems in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Secondly, the supplementary part of *Tao Zhuan* reflects Xiao Tong's Confucian thought of "Act with integrity but speak with humility" and "father's kindness and son's filial piety". Thirdly, the theme of *Tao Xu* is not Taoism, but "inherent virtue". Xiao Tong's *Tao Zhuan* and *Tao Xu* implied a crown prince's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governance, reflecting his 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 of Tao Yuanming's identity of "sage who live in seclusion".

Key words: Xiao Tong; Tao Yuanming;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inherent virtue; civilizing education

[责任编辑/周 舟]